

发挥高校在全球交流中传播中国声音的作用

□ 郑水泉

在全球化加速的当下，高校间的国际交流与合作已成为全球知识传播和文化交流的重要环节。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的统计与预测，全球高等教育国际学生数从2000年的211万人增加到2021年的639万人，增长了2倍，涉及的国家和地区超过200个。国际学术会议、跨国论坛等交流活动的数量和质量也在不断提升。中国高校积极参与推动全球公共外交，展现了传播中国声音、中国理论、中国思想的蓬勃姿态。

随着中国日益走向世界舞台中央，中国高校作为知识创新和人才培养的重要阵地，拥有丰富的学术资源和人才优势，在全球高校交流中扮演着独特的角色，肩负着传播中国声音的重要使命。中国高校传播中国声音，主要是通过开展国际学术交流活动、培养具有国际视野和跨文化交流能力的人才、推动中国学术成果的国际化传播等途径和方式，将中国的文化、历史、社会制度、发展理念以及在各个领域取得的成就等信息传递给国际社会，使世界更好地了解中国，消除误解和偏见，增进对中国的理解和认同。

当然，中国高校在传播中国声音的过程中也面临诸多困境和难点。例如，由于历史文化差异和意识形态不同、新闻传播和国际话语权不对等因素，一些西方发达国家民众对中国的社会制度还存在误解。这些误解很大程度上是西方

文化中根深蒂固的个人主义价值观和对不同文化制度的偏见所致。同时，语言障碍也是不容忽视的问题。据相关研究，全球约80%的学术论文是以英文发表，中国高校、中国学者在传播中国声音时，需要克服语言障碍，将中文的学术成果和思想准确地翻译成英文等其他语言。此外，传播渠道有限也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尽管互联网提供了广泛的传播途径，但在国际主流媒体和学术平台上，中国高校的声音相对较弱，中国高校主办的学术期刊在全球范围的影响力排名还不够靠前、数量不占优势，西方学术平台在国际舆论场中仍具有较大影响力，中国高校的科研成果有时难以获得足够的展示空间。

中国声音的更好传播应当充分发挥现有优势。从文化层面来看，中国拥有悠久的历史 and 灿烂的文化，例如儒家思想在全球影响力很大，有众多研究机构和爱好者；中医药已传播到世界196个国家和地区，得到广泛应用；武术更是在全球范围内拥有大量的习练者；等等。这些独特的文化元素具有很强的吸引力，能够为传播中国声音提供丰富素材。从学术资源角度看，中国高校近年来取得了长足的发展，2022年我国基础研究经费首次突破2000亿元、2023年达到2212亿元，实现了质、效、能的同步提升。据教育部统计，高校牵头建设了38%的国家高端智库，承担了90%

以上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这些学术资源为高校传播中国声音提供了坚实的理论支撑。此外，中国政府高度重视文化“走出去”战略，积极支持高校开展国际交流与合作活动。当前，中国已与180多个建交国普遍开展教育合作与交流，与50多个国家和地区签署了学历学位互认协议，设立了多项国际交流专项基金，这就为高校在国际上传播中国声音提供了政策保障和资金支持。

中国高校在全球交流中传播中国声音具有重要意义。在全球化的大背景下，中国高校应充分利用自身优势，积极采取有效措施。首先，加强国际学术交流。支持中国高校走出去，共同设立跨国研究机构，开展国际合作研究，例如中国人民大学、山东大学、四川大学、西南大学等国内高校与希腊雅典大学、佩特雷大学、亚里士多德大学和克里特大学共同合作成立希文明互鉴中心。贯彻落实习近平主席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通过办好高级别跨国学术论坛，鼓励高校师生积极参与国际学术会议和交流项目，在交流过程中展示中国的学术成果和发展理念。邀请国际知名学者和专家到中国高校讲学和开展合作研究，通过学术互动，促进中国声音的传播。其次，培养跨文化交流人才。在高校课程设置中增加跨文化交流相关课程，开展国际交换生项目和海外实习项目，增强

学生的跨文化意识和交流能力。提升师资队伍国际化水平，完善教师国际化顶层设计，推进教师培养培训国际化，积极参与教师教育国际标准制定，将弘扬教育家精神纳入国际传播话语体系，讲好中国教育家故事，扩大中国教育方案和标准的影响。中国人民大学依托在苏州设立的中法学院、丝路学院培养国际化人才，取得显著成效。再次，推动学术成果国际化传播。加强对学术成果的翻译和推广工作，提高学术论文、著作等在国际学术界的影响力。创办高质量的国际学术期刊，为中国学者提供展示学术成果的平台，同时吸引国际学者的关注和参与。最后，加强新媒体平台建设。借助社交媒体、网络直播等新媒体平台，开展形式多样的推介活动，如开设中国文化和学术讲座的网络直播、发布中国高校的科研成果和校园生活视频等，吸引国际受众的关注。与国际新媒体机构开展合作，拓展传播渠道，更好地传播中国声音、中国理论、中国思想，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作出积极贡献。

（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党委副书记）



澳大利亚如何疏解非首都功能

□ 宁国辉

澳大利亚首都堪培拉拥有约46万人口，以国家政治中心而闻名。这里汇聚着本国重要政治机构和决策中心，在国家治理中发挥着关键作用。多年来，堪培拉城市定位明确，不盲目追求经济等非核心功能的过度扩张，为做好疏解非首都功能进行了一系列探索。

澳大利亚疏解非首都功能的历史进程。在澳大利亚历史发展进程中，首都功能的确定与疏解历经波折。19世纪末，澳大利亚英属各殖民地掀起联邦独立运动，首都选址成为焦点。悉尼和墨尔本两大重要城市激烈争夺首都之位，僵持不下，直至联邦成立时仍未确定首都地点。

1908年，为平衡各方利益，澳大利亚联邦政府决定在悉尼和墨尔本之外另选新址作为首都，堪培拉由此诞生。政府高度重视其规划建设，组织城市规划设计大赛并从世界各国137份参赛作品选中美国建筑设计师方案，此后成立国家首都管理局负责土地规划与管理。从确定选址到1927年联邦政府正式迁往办公，堪培拉历经20年精心规划建设。

早期，堪培拉明确以政治功能为主导的定位，联邦议会、高等法院、总督府和总理府及联邦政府各主要部门在此设立办公场所，主要建筑多为政府和公共部门办公用地，与其他城市功能区分明显。随着时间推移，堪培拉人口有所增长，保持相对稳定发展态势，城市功能不断适应和调整。

近年来，虽面临经济全球化和城市化快速发展挑战，但堪培拉在探索多元化发展的同时依然坚守政治中心定位。澳大利亚通过合理规划堪培拉，成功疏解了非首都功能，为国家的稳定发展奠定了基础。

澳大利亚疏解非首都功能的具体做法。堪培拉作为澳大利亚首都，功能定位明确单一，聚焦政治层面。联邦议会、高等法院等主要部门在此办公，城市建筑多为政府办公场所，超三分之一雇员为政府及公共部门人员，有“公务员之城”称号。城市规划以政治功能为主导，未突出经济功能。且堪培拉位于悉尼和墨尔本两大经济中心之间，距离近，难以竞争，无法兼具政治与经济中心职能。这种定位避免了功能混杂，使堪培拉专注于政治事务，有效疏解了非首都功能。

构建便捷交通网络。澳大利亚重视交通网络建设以疏解非首都功能。堪培拉交通便捷，保障了与其他地区的联系。市内交通以公交为主，站点密集，方便出行。随着人口增长，城市轨道交通建设提上日程，2019年4月首条轻轨开通，扩建工程也在建设。国内交通方面，堪培拉距悉尼280公里，车程不到3小时，坐飞机仅1小时且每天有20多架次航班，机场还开通飞往国内各主要城市的航班。便捷的交通网络促进了资源流通和共享，避免首都过度集中资源和功能。

平衡公共服务资源。虽然堪培拉为首都，拥有许多全国性的社会和文化机构，如澳大利亚战争纪念馆、澳大利亚国立大学、澳大利亚国立美术馆、澳大利亚国家博物馆、澳大利亚国家图书馆等，这些机构为堪培拉提供了高质量的公共服务。然而，由于经济规模和人口体量的原因，堪培拉的公共服务供给相对有限，并且不够丰富，对年轻人就业、生活等方面的吸引力没有那么大。相比之下，各州首府城市既是本地区的政治中心又是经济中心，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的质量相对较高。这种公共服务资源的相对平衡，使得首都不会因公共服务优势而过度吸引人口和资源。

依托高校科研优势发展特色产业。堪培拉拥有如澳大利亚国立大学等一批高校和科研机构，这使其在人才储备和创新能力方面具备显著优势。近年来，堪培拉在可再生能源、太空科学、农业技术与环境科学、信息技术和网络安全等新兴产业领域都取得了一定的突破和进展。通过积极发展这些特色产业，堪培拉实现了经济结构的多元化。这种多元化的经济模式有效避免了因过度依赖单一政治功能而可能带来的经济发展局限。与此同时，它也避免了因盲目追求全面的经济功能而与其他经济中心城市产生冲突，确保首都能够更加专注于政治核心职能的履行。

澳大利亚疏解非首都功能的经验。单一功能定位促进有序发展。堪培拉作为澳大利亚的首都，其主要功能聚焦于政治层面，而经济和社会发展等功能则由悉尼和墨尔本等其他城市承担。这样明确的功能定位，使堪培拉能够专注于政治决策、立法及行政等核心任务。这种方式的优点在于避免了首都因过多承载非核心功能而出现的管理混乱和效率低下问题。此外，它还激励各地区根据自身特色和优势，有目的地发展经济和社会事业。悉尼和墨尔本等城市凭借自身的经济和文化优势，发展成为重要的



经济和文化中心，实现了全国范围内的资源配置合理化。由此可见，在定义首都功能时，应明确其边界，避免追求功能多元化。同时，利用合理的区域规划，引导其他城市承担相应的经济和社会功能，以推动区域有序发展和资源合理配置。

便捷的交通网络促进区域联动，提升城市间协作效率。堪培拉拥有的便捷交通网络不仅方便了市民日常出行，更重要的是增强了首都与周边城市及全国其他地区的联系。尤其是堪培拉与悉尼之间的顺畅交通连接，极大方便了两地间的通勤，促进了人员流动和信息交流。高效的交通网络提升了首都及其周边地区的连通性，促进了区域内城市间的协同合作。通过便捷的交通，城市间可以实现资源共享、优势互补，共同推动区域经济和社会进步。因此，构建高效的交通网络是提升城市间协作效率的关键，各国在城市发展规划中需重视交通基础设施建设，提高城市间交通便捷性，促进区域联动和城市间协作发展。

公共服务均等化促进均衡发展，减轻首都压力。各州首府既是本地的政治中心也是经济中心，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水平较高。这一均等化机制对促进全国各地区的均衡发展和减轻首都压力具有重要意义。一方面，公共服务均等化减少了公众对首都公共服务的过度依赖，从而减轻了首都人口压力；另一方面，该机制促进了各地区的经济发展，因为各地区都有能力吸引人才和投资，避免了资源向首都过度集中。由此可见，均衡配置公共服务资源对于减轻首

都压力和促进区域均衡发展至关重要。在国家发展进程中，应注重公共服务资源的合理分配，通过政策引导和制度设计，确保各地区都能提供优质的公共服务，实现全国范围内更加公平、均衡的发展格局。

政治功能分担助力均衡格局，实现健康和谐的城市群落。堪培拉虽然作为澳大利亚的政治中心，但其部分政治功能由各州首府分担。各州首府不仅是本地区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也是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质量较高的城市。这种分散式政治功能布局有助于减轻堪培拉作为首都的压力，并促使澳大利亚形成较为均衡的城市发展格局。一方面，各州首府分担政治功能，使政治决策和管理更加贴近本国地方政府，提高了国家治理效率；另一方面，这种布局也促进了城市间的协调发展，因为各州首府都有自己的发展重点和优势，可以相互合作和支持，共同推动澳大利亚的发展。合理安排各地区在政治功能上的分担，可以在确保国家治理效率的同时，促进城市间协调发展，形成布局合理的城市群落。各国在城市发展过程中，应根据自身国情和实际情况，合理分配政治功能，促进城市间协调发展和国家整体进步。



人工智能在全球范围内为媒体变革带来巨大机遇。据统计，各国政府在2015年—2022年期间推出了170项人工智能发展治理举措，而国际组织在同期推出了210项举措，这显示出人工智能技术的快速发展以及其在不同层面受到的重视。《2023年全球人工智能应用市场报告》指出，预计到2025年，人工智能技术将为新闻行业带来超过500亿美元的市场价值。

在新闻采集环节，人工智能可实现媒体数据的智能汇聚。新一代人工智能技术，推动专业生产内容（PGC）、用户生成内容（UGC）、人工智能生成内容（AIGC）等的全网汇聚。通过精准的搜索引擎、分析引擎和可视化组件，媒体能快速完成新闻线索、热点报告等融媒体产品的自动化采集。

在内容生产方面，人工智能可以极大地提高效率。人工智能尤其是生成式人工智能在文本创建、翻译、搜索、更正等方面展现出巨大潜力，以人工智能优化融合新闻生产流程，交融运用多媒介要素，推动技术与内容的深度结合，有助于产出逻辑更严密、信息更丰富的新闻报道。例如，在体育赛事、财经数据报道等专业领域，已经开始应用人工智能来撰写初稿。记者们可在此基础上进行深加工，从而节省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使他们能够更专注于深度报道和分析。

在信息传播方面，人工智能可以探索信息的分众化传播，根据用户的兴趣、行为习惯等数据进行精准推送。社交媒体平台和新闻客户端利用人工智能算法，能够将用户可能感兴趣的内容准确地推送到他们的面前，提高了信息传播的针对性和有效性，增强了用户对媒体的黏性。例如，媒体通过人工智能生成内容（AIGC）技术融合可视化数据、实景拍摄等内容，将抽象概念、高密度信息转化为可具象呈现的新闻产品，可使数据、观点平滑植入，确保信息传播有效性。

在媒体的交互性上，人工智能驱动的聊天机器人可以与用户进行实时互动。用户可以向聊天机器人询问新闻事件的相关信息，获取即时的解答，这不仅提高了用户体验，也为媒体拓展了与用户沟通的新渠道。比如目前一些新闻媒体推出的智能客服机器人，可以快速回答用户关于新闻报道的各种问题。

人工智能在媒体变革中也面临着诸多挑战。

伦理道德问题。生成式人工智能因训练偏差、数据质量等问题，其生成的内容可能存在虚假信息、误导公众的风险。由于缺乏人类的情感和判断力，人工智能在处理一些复杂的社会问题和价值观问题时可能会出现偏差，这就需要建立严格的伦理准则来规范其行为。美国新闻可信度评估与研究机构在2023年底发布的一份报告称，利用人工智能代理创建的假新闻网站在最近7个月内从49个激增到600多个，“人工智能正在成为下一个‘错误信息超级传播者’”。

数据隐私问题。人工智能的运行依赖大量的数据，在收集、使用和存储这些数据的过程中，如何保护用户的隐私成为关键。如果数据泄露，不仅会损害用户的利益，也会对媒体的信誉造成严重影响。但世界各国的隐私保护与数据使用的法律法规远没有跟上新的变化。如美国只有少数几个州有全面的数据保护法，尚未制定有关数据隐私的联邦法律，导致企业收集的用户数据大多不受任何形式的监督。

人才短缺问题。要实现人工智能在媒体领域的有效应用，需要既懂媒体又懂人工智能技术的复合型人才。目前这类人才相对匮乏，培养和引进这类人才成为媒体行业面临的重要任务。据相关数据，全球范围内对人工智能专业人才的需求呈现爆炸式增长，仅我国在该领域的人才缺口就高达400万人。

与此同时，全球人工智能治理格局也对媒体变革产生了很大影响。在法律法规方面，缺乏针对人工智能在媒体领域应用的专门法律。这使得媒体在应用人工智能时缺乏明确的法律依据，面临一定的法律风险。例如，对于人工智能生成内容的版权归属问

人工智能能为全球媒体带来怎样的变革

□ 赵申洪

题，目前各主要国家法律规定尚不明确，这可能导致版权纠纷。欧盟于2018年开始实施《通用数据保护条例》（GDPR），该条例规定了欧盟公民个人数据的收集、处理和存储所应遵循的规则，但在人工智能媒体应用的专门法律方面仍有欠缺。

在监管机构方面，没有专门针对人工智能与媒体结合的监管机构。现有的监管机构职责不够明确，对人工智能在媒体领域应用的监管还不够有力。这可能导致一些不良媒体利用人工智能传播有害信息，而得不到及时制止。美国国家标准与技术研究院（NIST）发布了《人工智能风险管理框架》（AI RMF 1.0），但该院只是一个标准制定机构，没有执法权，体现了监管机构的不健全。此外，我国在2020年成立了国家人工智能分技术委员会，负责人工智能标准的制定和实施，但该委员会的具体职责和权力还有待进一步明确。

在多边机制方面，国际组织之间缺乏协调，没有形成统一的治理框架。不同国家和地区对人工智能在媒体领域的应用有着不同的政策和标准，这给跨国媒体合作带来了困难。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发布的《人工智能伦理问题建议书》侧重于伦理原则，而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发布的《经合组织人工智能原则》则侧重于经济和社会影响，显示出国际组织之间缺乏协调统一。此外，二十国集团于2019年通过的《G20人工智能原则》，倡导以人类为中心、以负责任的态度开发人工智能，但在实际应用中，各成员国之间的协调仍存在较大问题。

展望未来，人工智能正推动世界各国媒体迎来重大变革，人工智能也有望成为一种崭新的媒介形态，推动人工智能与媒体的高质量融合发展已成为媒体行业继续生存和发展的必由之路。全球媒体要推动人工智能在媒体应用的全方位扩展，探索将前沿技术转化为公共产品的可能性，丰富人工智能应用的使用场景。要健全人工智能在媒体应用的规范性约束机制，建立更适应新技术环境的，包含尊重国家利益、社会团结、个人隐私、创新精神在内的行业伦理共识，形成推动技术向善发展的合力。此外，各国媒体还应站在更高的文明视角，探索人工智能媒体运用标准，弥合不同地区国家之间的智能鸿沟，围绕全球人工智能治理议题，加强信息交流和技术合作，致力于构建基于共同价值的人工智能伦理准则和全球治理范式，推动构建人工智能时代的人类命运共同体。

